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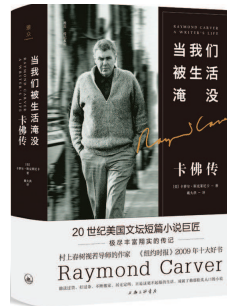


张鳞装手制书工
艺的人

阅读前沿

宋志坚——鲁迅与章廷谦校点的《游仙窟》
陈尚君——偶见杨凝式佚诗
吴思远——辜鸿铭是否担任过溥仪的「帝王师」
张家鸿——惬意的野风吹呀吹

每周一书



《当我们被生活淹没：卡佛传》

[美]卡萝尔·斯克莱尼卡著
戴大洪译
雅众文化公司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定价：88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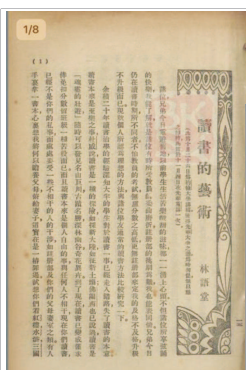
雷蒙德·卡佛，20 世纪美国极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家。他出身于蓝领家庭，大半生都在贫苦困顿中挣扎，在声名鹊起之际却因肺癌英年早逝。他的人生经历给他的作品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当我们被生活淹没：卡佛传》经传记作家卡萝尔·斯克莱尼卡倾尽十年心血写成，作者精心研读了卡佛的所有作品，并走访了与卡佛相关的数百位人物，获得了非常详尽的第一手资料。该书不仅详细地记录了卡佛的人生轨迹，同时披露了大量卡佛作品的相关写作背景，结合卡佛的生活经历对作品作出解读。阅读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到卡佛平凡又伟大的一生，同时也能给读者解读卡佛的文学作品提供新视角。

真正有效的教育， 是使校园形成浓厚的讲学风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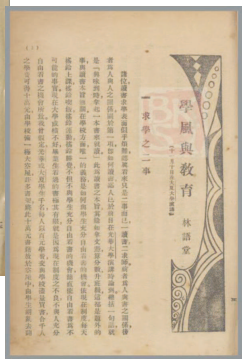
——林语堂演讲中的学风与读书问题

官立

林语堂的演讲稿
《读书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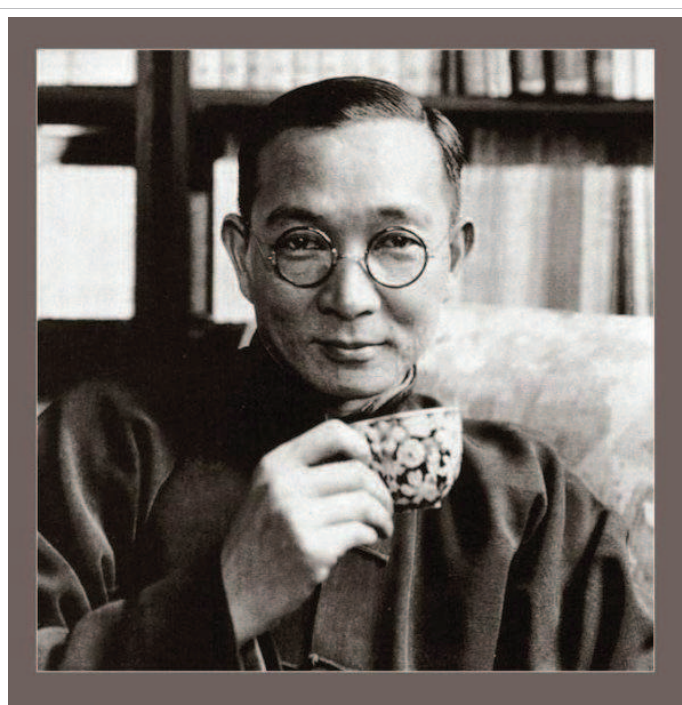
林语堂的演讲稿
《学风与教育》。



《语丝》第七十二期“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



生活书店于 1934 年 6 月出版的《大荒集》目录。



林语堂

近期，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众说纷纭之下，也引起了人们对大学学风问题的反思。其实，大学学风和如何读书的问题由来已久，80 多年前，著名学者林语堂就曾在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的演讲中屡次提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见解，也许不无启发和共鸣。

——编者

五次演讲，听者莫不为之动容

对现代作家的演讲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无疑有利于开拓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可惜这一微观研究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作家的演讲稿有的早已散失，有的即使保存下来，也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讲稿记录失真。林语堂在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作过五次演讲，其中前四次的演讲稿虽然已收入生活书店于 1934 年 6 月出版的林语堂的《大荒集》，但对于演讲的时间、演讲稿的刊载情况并没有详细注明，现将五次演讲的具体情况整理如下：

1929 年 12 月 26 日，应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邀请，林语堂作了题为“机器与精神”的演讲，演讲稿《机器与精神》刊于 1930 年 2 月《中学生》第二号。

1930 年 10 月 26 日，林语堂在母校圣约翰大学作了题为“读书的艺术”的演讲，“后得光华大学之邀，为时匆促，无以应之”，11 月 4 日用圣约翰讲稿在光华大学重讲一次。演讲稿《读书的艺术》初刊于 1931 年 2 月《中学生》第十二号，1931 年 3 月《读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重刊。

1930 年 11 月 10 日，林语堂在大夏大学作了题为“学问与学风”的演讲。演讲稿改题为《学风与教育》，刊于 1931 年 1 月《中学生》第十一号。据《大夏周报》第七卷第八号《林语堂程时焯莅校演讲》，“十日下午二时，举行纪念周会，是日特请中央研究院西文总编辑林语堂博士及前本教育课主任现任福建教育厅长程时焯先生莅校演讲……林博士演讲‘学问与学风’，详述读书之真正意义，勉励同学努力求学而成为真学家，并对现代学生生活多所批评……林程二先生之演辞，语多恳切，演毕后，听者莫不为之动容也”。

1932 年 12 月 8 日，林语堂在复旦大学演讲，13 日在大夏大学演讲，演讲稿题为《论读书》，刊于 1933 年 2 月《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1935 年 5 月 27 日，林语堂应大夏学文会邀请，在大夏大学大礼堂作了题为“中国的国民性”的演讲，演讲稿改题为《中国的国民性（一夕话）》，刊于 1935 年 7 月 20 日《人间世》半月刊第三十二期，署名语堂。据《大夏周报》第十一卷第二十九期《大夏学文会请林语堂博士演讲》，“听众数百。演词异常幽默。时而听众默无一言，空气甚为肃静；时而哄堂大笑，

竟有笑而不能闭口者。讲毕，同学有跟踪于林语堂大师之足后者”。

“学风”二字常被误解，失了本意

段祺瑞政府在 1925 年 8 月 26 日发布了“整顿学风”的命令：“迩来学风不靖，屡其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以致师生大多数之循分为学者大被侵扰，无以自安……无论何校，不得再借故滋事，并责成教育部拟具条规，认真整饬，不随不激，期于必行。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俱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其凛遵焉。”

果不其然，段祺瑞政府“依法从事”，酿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1926 年 3 月 18 日成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林语堂回忆，早晨 8 点左右，刚刚上任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的他就接到刘和珍以学生自治会名义请他批准停课一天的请求，他以为这次国民大会，纯为对外，“绝无危险，自应照准”，并且还告诉刘“以后凡有请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12 点时，他还看见刘和珍“欢天

喜地的游行和喊口号”。让他意想不到的，惨案发生了。下午 2 时，他到校开会，一闻噩耗即刻同许寿裳到国务院，进门开棺看到的头一个就是刘和珍的尸身，前后相距不到三个小时。

林语堂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开篇就提到惨案三日以来，他“总是昏头昏脑，表面上奔走办公，少有静默之暇，思索一下，但是暗地里已觉得是经过我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种种理由使他觉得刘、杨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他不仅回忆了刘和珍在冰冷的夜晚去他家归还演剧服装的情景，还把手头保存的刘和珍英文作文簿上的一段翻译了出来，表达了他的悲愤和悼念之情。

1926 年 3 月 29 日出版的《语丝》第七十二期是“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共五篇文章。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被置于卷首，接下去依次是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效廉的文章。另外悼念刘和珍、杨德群两位学生的文章，林语堂的写于 3 月 21 日，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写于 3 月 22 日，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写于 4 月 1 日。从脱稿的时间来看，林语堂是最早动笔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的。（下转第二版）